

# 乡情与学理: 近代经典村落文化的 跨语际分析及其历史书写<sup>\*</sup>

王天根

---

**【提要】** 近代乡村的选题及其研究,涉及历史知识乃至传统的转化与变革。历史知识及其论述的逻辑关联,涉及历史传统分析中情感或理智的趋向,也涉及中西文化会通。近代村落史学的跨语际理论分析框架及其实践,同样关联历史知识及其变革的实践,也承载村落这一社会单元分析的标准化、模式化的史学省思。以近代乡村史学探索及其传记式的书写为切入点,探索中国乡土社会的学理分析,考察逻辑框架、材料及二者结合度,是近代史书写的重要命题。由此关联近代乡土情结中的时代性、普世性分析,触及历史书写中的情感与理性尺度。

**【关键词】** 近代 乡土情结 情感 理性 村落 历史书写

---

如何面对传统社会中所谓“皇权不下县”,以及商品与资本对中国沿海宗法社会的冲击,并从历史纵向与社会横向剖析中国乡土文明,是中国史学探索的重要命题。近代有关村落文化的经典著述,涉及对经典概念的界定与理解。语义上经典涉及中国传统经书中的典范,触及经历史沉淀而流传堪称范例的文本。由此,经典区别大众传媒意义上的“流行”,尤其是经典涉及概念的学术原创性及其喻意乃至文本深刻程度。近代村落文化经典著述,涉及文本原创性及以小见大的个性化展示,关联历史传承与现实反省。而对近代经典著述评判,离不开中西文化交融互释、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考量。就近代社会学史意义上的经典文本而言,它涉及西方社会学理论、人类学理论的参照与中国国情意义上的调研和历史文献分析。而其历史书写,无论是采用传统家谱序列还是类似自传意义的个性化和情感化的“深描”,处理过的文本科学性,当不容置疑。这是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经典文本价值所在。以下经典文本的遴选及其逻辑标准皆以此为参照。

## 一、参酌中西: 跨语际乡土社会史的学理及田野调查

有关中国近代农村问题,早期西方对华传教士作了深刻的揭示。1899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 Smith, 1845—1932年)出版《中国乡村生活》,称“中国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通过对它的考察,我们将会更好地提出纠错改正的建议。”<sup>①</sup>明恩溥写作的阅读对象是英语世界,写作

---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项目编号: 15ZDB038)的阶段性成果。

① 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陈午晴、唐军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页。

范围涉及中国乡村的方方面面。他认为乡村生活是“单调和贫乏”的,由此论及“中国家庭不牢靠的平衡”“家庭的不稳定性”。<sup>①</sup>明氏这部著作颇有美国结构—功能学派的前兆,受到鲁迅和社会学家潘光旦等人的高度评价。

面对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近代转向,许多有留学西方背景的中国学人开始探索。他们多参照西方学理,进行田野调查,尤其注重乡土社会调查,约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主要是以曾留学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并于1913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陶孟和主持的社会调查研究所为核心;南派以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在柏林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的陈翰笙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为代表。就调研“乡土中国”而言,前者侧重分析乡村社会的生产力,特别是生产技术;后者受唯物史观影响,侧重揭示社会变迁体现的生产关系,重在从社会制度设计层面改造“乡土中国”。南派进行田野调查关注社会底层,从生产关系入手,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定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调研成果为土地革命合法性提供学理支持,从而重建“乡土中国”。陈翰笙领导的无锡调查体现了这一学术路径。他主张从社会关系的提升而非局限于技术手段等生产力因素解决江南社会危机,并涉及民意乃至人心维稳。相关调研及学理探索为西方社会学中国化提供了经验,也为执政者提供了国情咨询。

近代学术与政治关系复杂。学者毕竟不是执政者,“乡土中国”重建,涉及“国家”与“社会”学理层面的关系重构,这一任务在国民党执政秉持“军政—训政—宪政”的政治设计中究竟解决到什么程度,历史已作出回答。社会学分析框架不仅涉及学理探索,也涉及实践,需要国情意义上的实实在在的社会调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作了大量扎实的工作。针对中国农民、农村存在的“愚贫弱私”等问题,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于1923年3月26日在北京宣告成立。1929年,总部迁址定县,总干事为先后攻读耶鲁大学政治经济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的晏阳初。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强调“本会对于社会调查甚为注意;并认清中国的基础是农村,所以特别着重农民的教育和农村的建设,遂选定县为实验区。”“定县是中国一千九百余县中的一个县,人口约四十万众,约等于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县内的农民生活,乡村组织,农业等情形可以相当代表中国的农村社会,尤其是华北的各县情形,也可以大致说明全国农村社会的缩影。”<sup>②</sup>调研定县的目的是通过解读个案来呈现乡土生活和问题解决的共性。定县调研取得相当业绩,这从1932年晏阳初为《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所作序言中清晰可见,<sup>③</sup>但相关后续调研因受日本侵华的冲击而告终。相比之下,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情报人员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研究人员的身份在华北平原33个自然村开展实地调查,为日军的全面侵华做准备。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除团队外,也有一些在社会学领域崭露头角的个体学人深入乡村调研。1936年,费孝通实地考察江苏吴江开弦弓村,调研涉及中国乡土社会的处境与出路,侧重探讨乡村工业化及其与农村问题的关联。研究成果于1939年在英国出版,书名《江村经济》,该书在英语世界的同行阅读中颇为瞩目。据林耀华称“费孝通的《江村经济》1938年写成,1985年才在国内出中文全译本。我的《金翼》1941年写成,也是到1989年才出全译本。这都是社会场景对作品流通的影

① 参见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第245—267页。

② 李景汉编著《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5页。

③ 李景汉编著《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1—4页。

响。”<sup>①</sup>费孝通、林耀华是“西方社会学中国化历程”重要学者吴文藻的高足。1928年,吴文藻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1929—1938年,他在燕京大学任教,邀请英美社会学大师来华讲学。例如,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代表性人物、人文区位学的理论创始人罗伯特·帕克于1929、1932—1933、1937年三次来华讲学。1935年,英国人类学功能学派创始人布朗受邀来华讲学,并指导林耀华的硕士论文。这表明以英美为代表的社会学、人类学在中国社会学发展过程中颇有影响。此时的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采取“请进来”与“走出去”的战略。1937—1940年,林耀华被派往哈佛大学留学,获人类学博士学位;费孝通前往伦敦大学,于193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这些举措皆是吴文藻的精心布局。在“西方社会学中国化”历程中,中国本土学人的村落调研及书写受不同学理参照的影响,而在乡情、国情方面尤其受时代的影响。

事实上,早期的社会学学者非常重视本土学术经验。1933年6月,林耀华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所编的《社会学界》第七卷上发表《严复社会思想》一文,称:吴文藻一直倡导研究严复生平与学说,后得到严复后人严群的帮助。<sup>②</sup>该文在“学说渊源撮要”以后尚有“社会进化之原理”及“国家进化之根本原理”两章,因篇幅关系,在《社会学界》发表时均被删去。<sup>③</sup>但社会进化与国家进化,涉及进化论架构上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林耀华在中国社会学的开拓上,可谓学有渊源。

留学美国的林耀华和杨懋春有关中国村落的经典书写,关联抗战语境下中国乡土省思,皆为英文论著,涉及跨文化、跨语际的乡土文化传播。在燕京大学求学时,林耀华接受的社会学框架多为欧洲范式,主要是英国范式。从林耀华于1932年开始的中国乡村社会调查报告中可知,乡村乃至村落社会学分析所涉及的结构功能主义思路一直影响中国学人对村落社会的史学分析。林耀华称,他两度进入华北村落,开展普通礼俗调查:一次是1933年暑假回到家乡福建,先对宗族乡村进行普遍的观察;另一次是1934年1月31日离校前往福州近郊的南台岛义序乡,实地调查三个多月。<sup>④</sup>后来,他以此为基础撰写硕士论文。林耀华称“义序是一个乡村,因为全体人民共同聚居在一个地域上。义序是一个宗族,因为全体人民都从一个祖宗传衍下来。前者为地域团体,后者为血缘团体。义序兼并前后二者,就是一个宗族乡村。”简言之,“义序乡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宗族村落,近万人中98.4%的人口为黄氏族人。”他认为“聚族而居多在华南,华北则多异性杂居。”<sup>⑤</sup>这篇硕士论文系1935年秋由英国社会人类学功能学派拉德克利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指导。布朗是社会学创始人斯宾塞的继承者,这从其著述大量征引、认可斯宾塞的著述或观点中可见。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涉及社会有机体论、社会进化论以及二者的比较分析。社会有机体论涉及社会结构及其功能,而社会进化论涉及社会功能及其变迁。布朗的《社会人类学方法》有相当篇幅分析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进化观念就是一方面是有机体生命,另一方面是社会生活的进步潜在性的实现。这个理论可简括为三个基本命题:(1)有机体进化和社会进化都受制于自然规律的自然过程。(2)进化过程是一种趋异的发展……(3)无论是有机体的进化还是社会进化,其中都存在一普遍趋势,斯宾塞称之为‘组织的进步’。”基于此,布朗认为“结构是关于人的配置,而组织则是关于活动的配置。”由此,“在

① 林耀华《林耀华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页。

② 林耀华《从书斋到田野》,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③ 王天根《群学探索与严复对近代社会理念的建构》,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4—5页。

④ 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导言”,第2页。

⑤ 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第1、225页。

社会结构所包括的任何关系中都有这样一种期望,即一个人应遵守某些规则或行为模式。”<sup>①</sup>与斯宾塞所谓“社会学为综合的哲学体系”的论述相比,布朗尤其注意社会学概念的精当与逻辑体系的严密。布朗认为“术语‘制度’(institution)就是用来指:一个已建立的制度、社会公认的规范体系或关于社会生活某些方面的行为模式。”<sup>②</sup>基于“制度”层面架构的“社会结构”布朗认为“社会结构应被定义为:在由制度即社会上已确立的行为规范或模式所规定或支配的关系中,人的不断配置组合。”<sup>③</sup>在华期间,布朗曾在吴文藻编的《社会学界》第九卷中刊发《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系其1935年在燕京大学的讲稿。布朗讲稿区分社会调查与社会学调查,理论结合实践,将社会学调查所引用的方法界定为“社区视作体系的研究,包括两方面:适应与完整。”<sup>④</sup>

针对中国社会体量较大、较为复杂,布朗称,“势必视作许多较小社区相互关联而成的一个集体”,由此横向外联,“中国可说是省、县、村镇,或最小的单位,‘户’的集体。因此,吾人研究必须由最小的单位‘户’起始,由此而推广至于全国,乃至整个的世界社区,而中国乃是整个世界社区的一部分。”中国社会单元的研究,“最适宜于开始的单位是乡村”。<sup>⑤</sup>林耀华在自述中称“拉德克利夫-布朗与马林诺斯基一起被视为功能学派创始人,但拉德克利夫-布朗更强调社会体系的结构原则和规范在社会功能上的一致性。他认为某种社会结构是对当地社会关系的一种特定安排。不同的个人和群体在其中彼此调和各自的利益。研究一个社会,就要搞清楚它的这种结构及其中的各种关系。了解它们之间的互动互补性以及它们发挥的彼此连贯的社会功能。结构功能学派影响了中国人类学、社会学界的一大批人。”<sup>⑥</sup>作为助教的林耀华更是将其运用到福建乡土的调研之中。

布朗曾指出“一个完整的乡村社区的研究,包括这三种分别的而却相关联的研究。”即,“甲:横的或同时的研究(synchronic or monochronic study)系研究某指定期间内某社区的内部结构和生活,而不涉及其过去的历史,或正在进行中的变迁。乙:乡村社区的外部关系的研究,即系研究该社区与其他种种社区的外部关系,以及本社区与较大社区的外部关系,而本社区即此较大社区的一部分。丙:纵的或连绵的研究(diachronic study)系研究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中已经及正在进行中的变迁。”<sup>⑦</sup>对此,林耀华称“此派主张在实习之前,必经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先有理论背景,到实际工作的时候,才可互相参照,互相考核,养成理论根据事实,事实符合理论的观念。实习之后,发现材料缺点,或是疑难问题,就得重新从事调查;研究起始为实地工作,至终还是实地工作。”<sup>⑧</sup>基于调研,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的架构为“宗族乡村的基础(地理基础、生物基础、经济基础)”“宗族组织的形式(祠堂、庙宇、联甲、结社)”“宗族组织的功能(祖宗祭祀、迎神赛会、族内法政、族外交涉)”“宗族与家庭的连锁体系(宗教与家庭的关系、家庭的基本结构、家庭的生命史)”“亲属关系的系统与作用(亲属关系的系统、亲属关系的作用)”“出生与童年(个人生命史绪论、出生时期、童年时期)”“婚嫁(婚嫁前期、成婚时期、婚嫁后期、变式婚姻)”“死丧(丧事仪节、吊奠佛事)”“葬祭(葬事仪节、祭祀仪节、个

① 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夏建中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160、165页。

② 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第165页。

③ 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第167页。

④ 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附录”,第182页。

⑤ 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附录”,第182页。

⑥ 林耀华《林耀华学述》,第34—35页。

⑦ 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附录”,第183页。

⑧ 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导言”,第2页。

人生命史总结)”。除在关系中把握结构,他还强调文化及外来要素,“注重横的分析,以宗族乡村未受外来文化影响为标准”。<sup>①</sup>在林耀华看来,西洋思想、新文化运动、新兴经济势力、政治改革导致宗族动摇乃至近代变迁。

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涉及行动控制与思想、感情的关系,关联舆论、宗教及理论等。布朗称“可以提到一个目前或者尚未足以加以严格的科学研究的题目,即是对于指导及控制各个人行为的思想与情操,作系统的研究。这些思想与情操,乃一个文化或文明的特质之所由来。而这特质即该文化的‘民族精神’(ethos)所以不但中国与欧洲的价值观念以及信仰或思想制度迥乎不同;即在中国一国之内,农村与城市有差别,此地与彼地亦有差别。”<sup>②</sup>在布朗的影响下,林耀华晚年从事中国原始社会的探讨,其论著师承布朗《原始社会的结构和功能》的衣钵。

## 二、近代乡村经典案例及其书写中的情感因素

就城乡关系而言,在有五千多年农耕文明史的近代中国,占主角的是乡村而非城镇。村庄文化构成中国基层社会的基本单元,尤其是传统社会人生奋斗哲学讲究“修、齐、治、平”,“齐家”与“治国”联为一体,“家”是“国”的放大,“国”是“家”的缩影。通过村落历史研究,解析、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当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常用的研究方法。社会学家擅长考察村落的结构、功能以及因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村落功能的嬗变。村落除了像社会细胞一样,空间上具备横向解剖可能性,时间上村落还有自己的历史变迁。变迁速度上的骤缓与其社会结构、功能的变化,往往有着内在的一致性。<sup>③</sup>

以村落文化及其变迁剖析为个案,分析基层乃至“家”“国”运动的联动,为抗战前后留学海外的华人的重要选题。林耀华的《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以下简称《金翼》)<sup>④</sup>和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以下简称《一个中国村庄》)便是其中的代表作。1944年,林耀华写成社会学专著《金翼》。它类似自传,用文学方式,述说了两个合伙经商家庭的变迁。黄东林和张芬洲是姻亲兄弟,黄东林的姐姐嫁给张芬洲。两家发展或衰落时光历经25年。此前,他们利用亲情搭伙,可谓是志同道合,利润上颇有获益。发达后,两家都重视衣锦还乡的财富展示或炫耀,在故乡建新房,且新居比邻,受到路人或邻居的称赞或羡慕。25年后,两家的格局迥异。黄东林及其家族迅速崛起并脱颖而出,家族人丁兴旺。相比之下,张芬洲则家境凄凉,生活窘迫。最后,寡妻和养子回娘家和远戚过日子活命。面对民间传统文化与经济背景及新的商业经济崛起,《金翼》述说两家应对新的发展如何调适,或因不能适应而日渐衰落,并再现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农村生活的情景与经济变迁。结合结构功能主义分析可见,同样面对外来的冲击力量,经历磨难与挫折,以黄东林为核心的黄氏家族能对自己赖以生存的社会关系网络不断的调整与修复,从而在新的平衡状态中继续运转。张芬洲家族的社会关系网络运转则完全相反,其衰败的命运不可避免。林耀华剖析故土乃至村落家族所用的“手术刀”系结构功能主义学理加上“平衡论”,多为乃师布朗思想体系的一部分。

① 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第4页。

② 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附录”,第185—186页。

③ 王天根《史学框架与史学求真的限度——兼论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的史学转向》,《安徽史学》2011年第5期。

④ 此书为1948年版。另有1944年版,林耀华时年34岁,题名为《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在林耀华《金翼》英文版导言中称 林耀华提出一个综合性观念“人际关系体系处在一种持续均衡状态中,这种均衡不时被外部力量所打乱甚至建立新的均衡。‘人类就是在平衡与失调、均衡与不均衡之间摆动’。这样一种综合的概念当然不过是一些试图理解和表达一个复杂的现实的可行方式,这仍是社会科学家所讨论的一个主题。”<sup>①</sup>黄氏家族史叙事快要结束时,恰逢全面抗战爆发,中国乡村面临战时状态下的社会关系调适。

留美华人学者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用社会学方法对自己出生、成长的地方进行解剖,是典型的社区研究之作。与布朗创设的社会人类学相比,杨懋春著述受文化人类学的影响,他说“社区研究是本世纪初崛起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新方法。它把一个相对独立的社区作为有机的整体,通过揭示社区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此社区中人们的生活、思想和感情。”杨懋春意在“描绘出一幅整合的总体的画面”,他“没有把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方面——经济、社会、政治、宗教、教育——分别详加描绘,而是以初级群体(即家庭)中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为起点,然后扩展到次级群体(村庄)中初级群体(家庭)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使“台头村这个乡村社区在文化中被读者理解。”<sup>②</sup>时值中国抗战即将胜利,“抗战建国”语境下的乡土重构提上议程。杨懋春指出“当乡村复兴运动在国家重建计划中越来越重要时,政治家、经济学家和社会领导者逐渐认识到,对中国过去和现存的乡村生活进行科学和全面的研究是推进这一运动的基础。这类研究有助于消除自运动一开始就出现的大量浪费和无效,而且还能够防止重大的失误。”与此同时,中美关系及其变动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重要主线,他对此指出“当前世界形势是国家之间的交往日趋密切。目光远大的政治家和人文研究者认识到相互交往的基础是各国文化的相互理解。我们高兴地看到,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中国很荣幸地被众多西方学者从文化角度进行研究。本书是这些项目中的一小部分。作者希望这项工作能有助于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沟通。”<sup>③</sup>简言之,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最初主要是为美国军政商学界认识中国社会变革及其国情而著,其后成为学术经典则另当别论。

《金翼》与《一个中国村庄》是中国村落史学跨语际书写的典范之作。就写作路径而言,《金翼》侧重西方对华商战及商品、资本对福建沿海宗法社会的冲击,关注内乱、外乱对乡土社会关系的震荡。“山东台头”属中国东部沿海,除“深描”中国乡土社会结构和权力运转外,《一个中国村庄》专篇交代作者“天喜”在与乡土关系疏离、走向都市的个人成长经历,而《金翼》基本属于自传或自述。为了处理好故事性、自述与学理阐释的关系,《金翼》前后有两个版本:前者夹叙夹议,后者将自述与理论分置。研究者核对《金翼》两个英文版本后指出“如1944年版第一章‘东林的早年生活’的前三个段落,在1948年版本中变成了英文版前言的一部分;第一章比修订版多了三个段落,是关于关系网络和命运的探讨;第二章有一个段落是修订版中没有的,是关于平衡、调适和再调适的;第三章有两个段落谈到东林建立的平衡有被打破的危险,而芬洲却帮不上忙,这在修订版中没有;1948年版将1944年版的最后一章的结尾加以修订,并增加了新的理论解说专章。”<sup>④</sup>该版故事细节调整较少,集中阐释的理论置于最后。《金翼》属自述性的社会学专著,自述尤重视“讲故事”,有情节构思等文学表现手法。对此,时任太平洋学会会长的腊斯克(B. Lasker)为1944年版《金翼》作序称“本书是与

① 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庄孔韶、林宗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5页。

② 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张雄、沈炜、秦美珠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译者序言”第1页。

③ 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作者前言”第6页。

④ 庄孔韶《前言〈金翼〉两个版本的差异》,林耀华《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庄孔韶、方静文译,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iii页。

众不同的,因为书中揭示了家庭的运作以及适应现代需要的内部动力。本书的表现手法也别具一格,但我希望学者们不要因此而否定其科学的分析和特点,其方法显然可称之为‘参与观察’。尽管也许不能完全确定作者就是族长东林之子,却有足够的根本性资料表明,他同这个家庭的关系无比亲密,他对这个家庭自1910年至大约1941年日本人进攻福建期间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了如指掌。”“这部书读起来就像小说,它的最佳之处是娓娓道来,细致入微。”<sup>①</sup>意在跨语际意义上丰沛情感的文学叙事也可呈现家族史学探索的科学性。

相比之下,告别中世纪中国乡土社会步履蹒跚,其近代转向到当下有百年之久。美国学者周锡瑞以妻子叶娃、岳父叶笃庄所在的华人家族为主线,用英语写了一本关于叶家百年家庭史的书。周锡瑞自述“在美国大学从事中国史教学四十余年的我,特别希望美国学生能够了解人性化的中国现代史,了解从晚清、民国,及至共和国,现代中国革命性的变革如何影响了一个中国家庭几代人的命运。”<sup>②</sup>叶家发达于安徽近代首府安庆,后来飘散到全国各地。这涉及救亡图存的语境。这部家族史学著述受到史景迁、柯文、罗威廉、裴宜理等美国学者的高度评价。中国大陆近代史研究专家章开沅称“这个古老的家族包括‘安庆叶家’与‘天津叶家’两大阶段,前后历时数百年之久,活动范围更覆盖国内外许多地区,其间重大历史事件之多与社会变迁之大,亦属家庭史中所罕见,非大手笔不能驾驭自如。应该说,《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没有辜负笃庄老人的遗愿,出色地完成了叶氏家族史的著述。”总体上,“《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不是古老家族与世家的挽歌,更不是单纯抒发怀旧的咏叹,它只是一个真诚的学者履行守望历史与解释历史的职责。”<sup>③</sup>章开沅相关评论关联局内人、局外人看待叶氏家族的立场,也涉及作为女婿的历史学家如何看待叶氏家族史。而周锡瑞在自述中说“这本书是一个外国人或局外人对叶家和中国现代史的理解,自然不同于叶家成员对自己家史的认识。”作为史学工作者,“我无法丢弃自己作为史家对历史客观认识和描述的责任。”<sup>④</sup>无论是林耀华的《金翼》还是《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以下简称《叶》),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是近代“家”乃至“家族”文本书写的重要前提。《金翼》《叶》二者拟题文学隐喻乃至谐音,“异域同风”,个案选择都属经典。这些从书写修辞学上来看,可谓不谋而合,何况两者时间有先后。

简言之,近代乡村经典文本特别是跨语际江南社会村落传记式的书写,书写者为当事人或旁观者。当事人书写无可避免地涉及乡土情节,而作为职业历史学家的“旁观者”,应当在历史叙述的理性上有所坚持。

### 三、史学认知与华北乡土史探索

以家族乃至村落为核心的乡土史及其书写,既涉及整体的史学解读,也有观察视角的中外迥异。美国与欧洲汉学颇有不同,而美国汉学内部在学理和解读框架上也有学派之分。同一门派往往也有关键概念与分析思路的不同。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哈佛大学费正清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解释框架上延续马士等人的中国学历史传统,强调西方“挑战”和中国“回应”的“西方冲击论”,而“冲

① 林耀华《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英文版序”,第ix-x、xi页。

② 周锡瑞《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史金金、孟繁之、朱琳菲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中文版序”,第9页。

③ 周锡瑞《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推荐序”,第3、7页。

④ 周锡瑞《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中文版序”,第10页。

击一回应”模式在心理学乃至传播学上对应的是“刺激—反应”模式。就国情而言,中国传统社会的农耕方式呈现自给自足的社会生活状态,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社会秩序的平稳;社会秩序的延续则意味着社会发展态势可以预期。而近代救亡图存压力下社会秩序的断裂(类似辛亥革命导火线之一的湖南长沙等地抢米风潮的历史悲剧一再重演),则表明政治变革的可能性已经存在。面对改良或革命的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正当性及其与近代国人寻求富强道路是什么关系?面对乡村变革的政治道路选择,近代社会危机下中国与西方究竟有何不同?江南、华北乡土问题的解决依靠生产力的提升还是生产关系的变革?等等。这些弥久常新问题的解决及其学理参照,始终是汉学界乃至中国学者绕不过去的话题。20世纪30年代,“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日本情报人员极其活跃。他们在华北众多自然村进行深入而细致的调查,形成大量的秘密文献。正是利用这些文献档案,黄宗智于1979—1980年写成了《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1980年,黄宗智来华后又访问其中两个村庄。基于文献和调研的经济人类学方法,黄宗智不仅对华北农业、工业作了局部剖析,还将其置于整个华北予以解读。黄宗智称“满铁资料不失为用现代经济人类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农村的一组数量最大而内容又极为丰富的资料。”<sup>①</sup>基于“满铁调查的33个村庄社会经济轮廓”,作者区分类型“第一型,经济作物占播种面积10%以下的商品化程度低的村庄;第二型,经济作物占播种面积10%至30%的中等商品化村庄;第三型,经济作物占播种面积30%以上的高度商品化村庄;第四型,手工业发达的村庄;第五型,市郊村庄;第六型,出外佣工工人的家乡;第七型,经历战祸的村庄。”在逻辑上,“区分高度商业化、商业化程度较低和中等商业化的村庄,有高度发达手工业的村庄、市郊村庄、作为移徙东北佣工工人家乡的村庄,以及严重遭受军队蹂躏的村庄。本世纪变化不大的村庄,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可以用来了解清代自然村的基线。”论及近代村庄与政权关系,该书“用十九世纪一个县政府的档案资料,来探讨当时税收情况和国家对村庄权力的限度。30年代,关于各村如何针对现代国家机器企图进一步控制农村而采取的措施的口述资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清代的情况”,也“将试图证明清代华北的村庄,在政治上和社会关系上,均比我们过去想像的要闭塞得多”。<sup>②</sup>基于满铁文献,黄宗智有力地分析华北村落与国家权力向基层渗透及基层如何应对权力的结构性运动。

在学理架构上,黄宗智首先交待问题缘起、研究的村庄、所引用的史料,也涉及生态环境;其次,聚焦经济内卷和社会分化。作者借用“经济内卷”的概念来分析华北的经济社会,试图“证实人口压力常使冀—鲁西北平原贫农农场劳力的边际报酬,降至雇佣劳动工资和家庭生计需要之下”。他说:“如在图上以垂直轴线代表产量,水平轴线代表投入的劳力,‘内卷’的现象出现于显示产量与劳力之间的关系的曲线开始向后右伸平之后,即劳动力边际产量开始递减之后。”再次,讨论村庄与国家关系,即“在村级资料的基础上,试图描绘二十世纪自然村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的演变情况。”黄宗智强调赋税这一村庄与国家之间的主要交叉点,意在强调“二十世纪地方政府权力的扩张,并对乡村的渗透和榨取,都超越清代的国家机器”。由此分析,“本世纪村庄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止取决于国家政权的性质,也受到村庄内部结构的影响……伴随半无产化过程而来的,是紧密内聚村庄的日益松散化。自耕农之转化为部分或完全脱离土地所有,每年以部分时间外出佣工的贫农,意味着许多村民与村庄整体关系的逐渐松弛,以及紧密村庄向松散的社团的转化。在二十世纪频繁的天灾人

①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中文版序”第1页。

②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319、28、28—29页。



祸的摧残之下,更多的自然村也日趋松散。”具体而言“半无产化与官僚化两个过程的交接,导致了村庄与国家之间新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村级政府——村庄内在权力组织与外来政权的主要交叉点——尤其显而易见。有的地方出现了‘土豪劣绅’和‘恶霸’(后者是北方较通用的称谓)的滥用权力,蹂躏村庄。也就是毛泽东(1927)、费孝通(1948)和丁玲(1949)等人都曾注意到的问题。”这种村政权的兴起,正是黄氏“探讨的农业内卷化,和伴随商业性农业而来的阶级分化,怎样影响自然村及其与国家关系的明显例证”。<sup>①</sup>他“试图把满铁资料所显示的一些本世纪的社会经济变化的趋势追溯到清朝前期,而对近数百年来华北农村的演变型式提出一些初步看法”。<sup>②</sup>黄宗智有效地利用满铁关于华北区域经济方面情报文献,并结合劳力投入方面的内卷化学理进行探讨,结论颇有启迪。

正是在满铁档案基础上清晰地勾勒出华北村落变迁的经济历史轨迹及其与国家权力的关联,黄著在英语乃至汉语世界的影响远超一般经济史学论著。参酌中西,黄宗智有关华北小农经济探讨有比较的视野,他认为“西欧的小农经济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改造时,中国的小农经济却在日益内卷化。西欧的小农社会经历阶级分化和全面的向资本主义转化时,中国仍停留在小农社会阶段。西欧越来越多的小农转化为新兴的无产阶级成员时,中国的小农仍为小农,只是经历了部分的无产化。这些差别,是双方财富与势力的不均衡,是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之害的社会经济背景,同时也是促成十九、二十世纪大规模农民运动的乡村危机的根源。”“华北平原农村的变化,充分反映出这一乡村危机的形成过程。”<sup>③</sup>与华北相比,如何看待江南乡土危机却是近代有待探索的命题。

#### 四、乡土历史书写中的情感主义省思

近代中国遭遇空前的时空裂变,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下,社会秩序失范。就救亡图存语境中社群、个体关系而言,时空裂变下人的身份认同遭遇困惑,无疑要借助历史的坐标辨明位置。国家、社会如此,民族、个人如此。救亡图存压力下国家与社会关系重建,亦如此。

中国近现代史学社会史学的研究,多受现实感召。通过中西文化交流,中国学人的选题注意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论意义,与西方发达国家日益接近。“学术大家”的所谓中国问题、中国意识的关照,亦日益增多,但解释框架与话语编织,多为西方路数。由此而言,探究近代政治变革与社会秩序关系的重建,弥久常新,问题是从什么层面进行分析。上述经典案例从另一侧面表明,近代村落研究中存在样本选择及样本分析的标准化等困境。实际上,近代中国的乡土重建关联权利网络,涉及地方政府、中央权力,乃至地方民众与文化精英等社会权力资源重新分配,但分析不宜套路化。

解剖乡土文化,经典型涉及文化符号的意义。分析乡土文化符号的编码、解码及其呈现出来的社会意义,现在多有套路。案例的选择愈加个性化,得出的结论愈加标准化。例如,围绕介于城乡之间的城墙拆迁问题。官方注重城市的现代性,强调要拆除;民间因涉及自己一贯的利益,强调维持现状等;地方绅士或文化精英多被塑造成公共知识分子,利用人际网络进行利益折中。学人基于上述利益分配,往往从个案中分析所谓的“地方性话语与地方权力的关系”。学术探索中的“这堵墙”涉及的交锋及其矛盾冲突的结果被赋予传统性、现代性的象征意义。“墙”作为社会文化史考察的样本变成

①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6、30页。

②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文版序”,第1页。

③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301页。

权力斗争的文化符号,“拆去”意味着官方意志、中央的权力,“不拆”暗示着地方力量的作用,意味民间权力网络的牵制。这样的个案解析,偶然为之,很有新意,但多了,令人生厌。再如,对“井”的解读,“井”多为故乡、故土象征的文化符号,也多有思乡的情怀。“井”作为象征性的文化符号,结合中国传统的祠堂、宗族,乃至风水,有传统文化意蕴。“离乡背井”多为“伤春悲秋”的文人墨客所吟诵。北方挖井争水则多为水资源。水资源的分配及象征,涉及地方权力的再分配。地方性资源如何在其中起作用、地方性知识及地方性网络如何运作等问题,多为学者关注。这些分析有道理,但问题是,在所谓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关照下,相关论文发表不仅过多过泛,以“墙”或“井”作为近代乡土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样本及类似学术生产流水线,模式化显而易见,何况背后涉及近代国家权力向乡土社会渗透过程及其书写中的情感与理智。

近代乡土文化的呈现或展示及其历史书写,大致涉及叙事的理性趋向等,关联多方面的学术命题。近代社会史学关涉结构功能主义学理参照,得失利弊,值得省思。诸如人来到世界上即无形中进入一个社会框架与社会结构。框架与结构往往给定,就像网络,很难脱离。无论是有形无形,“我们”总是身处其中。村落、城市皆属社会结构,从乡村走向都市,“流民”身份认同往往经历痛苦蜕变。相较而言,村落无疑是自然存在的生活世界,都市则是“人化的自然”。两者的距离多是不同的游戏规则起作用,村落里的狠人大多是小混混,而都市往往是流氓或黑势力。以乡土社会中的“小聪明”来对付城镇里的游戏规则,无疑是要付出代价的。村落史自述中“我”“我们”在社会分层认同时往往遭遇这些规则,情感书写更属重点,这些有待“深描”。再若分析村落与仪式关联,村落中的集体意识往往通过乡村仪式进行。丧葬仪式,意在警醒后人反省生死,也有唤醒亲情之意。这里涉及人的生与死的界线。死亡的社会性,可作仪式与符号分析。死亡的社会场域,涉及社会网络与权利关系。这些往往是近代村落文化史学分析中的重要命题,更宜在文明史类型学范畴内比照,从而展示民族文化的区域特色。村落的文化探讨还可以从记忆与历史、想象与空间的范畴作更为广泛的空间探讨,而时代性发掘尤宜于强化。

(作者王天根,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邮编:230601)

(责任编辑:敖凯)

(责任校对:李桂芝)

and methodology , one can use images to collaborate with history or vice versa. In addition , both the ontological analysis of images and the discussion of their context are essential for us to bring images into history. In this process , in order to avoid falling into the traps and misunderstandings ,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image research , to grasp the images on their own as well as within their contexts , as comprehensively and accurately as possible.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appropriate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age documents and text documents. On the whole , image into history is not only a theory , method , and practice limited in the history discipline , but also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paradigm calling for multi-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The Turn of Liang Qichao's Worldview in His Later Year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A Record of My Travel Impressions in Europe* // Ouyang Zhesheng**

Liang Qichao formed his worldview gradually while observing the Great War in Europe. He participated in the debate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 and started to develop his worldview. After his return from Europe , he published *A Record of My Travel Impressions in Europe* and added new elements to this cultural debate. He demanded emancipation of mind , and advocated the rule of law , constitutionalism , autonomy , and national movements. He warned people not to rush , and he was against excessive nationalization policy in China. He called for a fu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the future , arguing that China should take more responsibility in the world. These proposals were both new and constructive. It is neither appropriate to classify Liang Qichao as a cultural conservative nor placed him in the school of Oriental culture.

**On the Formation of Oral Texts and Their Authenticity: A Case Study of *The Anecdotes in the Mansion of Confucius' Descendants* // Kong Yong**

Oral history is an important genre that carries historical memory. To some extent , the authenticity and credibility of oral contents are predetermined by whether or not the recorders followed the standard procedures through which to preserve oral memories and form oral texts. Edited by Ke Lan , *The Anecdotes in the Mansion of Confucius' Descendants* is a text based on Kong Demao's oral recollection. Because of som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 many stories disclosed in this text are not quite true , which affects its value as historical source. This article selects three important cases , and argues that they are flawed. Two stories recorded in “The Princess married to the Kong Family Mansion” and “Madam Tao poisoned Madam Wang” are not in conformity with the facts , and the one in “Confucius's Encounter with Nan Zi” contains elements of errors and exaggerations. The three cases offer examples on the types of oral memories , from “remote memory” , “reminiscence” to “supplementary memory” . They reflect the speakers ' contemporaneous reflection of historical events rather than the authentic representation of historical events. And they also provide us with a sense of new “historicity”.

**Local Complex and Theoretical Landscape: A Translingual Analysis of Modern Classic Village Culture and Its Historical Writing // Wang Tiangen**

The issues concerning farmers , rural areas , and even agriculture are fundamental issues affecting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eople 's livelihood. These issues are related to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historical continuity and change. One needs to grasp the transformation and change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and even of tradition in order to select a topic for research of modern countryside. For example , in order to set up the logical correlations between historical knowledge and its discourse , one needs to be aware of the tendency of emotion or reason in the analysis of historical

tradition , as well as the dynamics of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The cross-lingual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modern village historiography and its practice are also related to the practice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One can analyze villages as a social unit in historical reflection. It is thus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to take the study of modern rural history as a starting point , which often takes on a biographical form. In research , one needs to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and examine its logical framework , its materialistic basis , and the degree of combination of the two. In doing so , one can connect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content with universal analysis , so as to start to discuss the emotional and rational scales i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Influence of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 Bolshevik ) : Short Course* on Fan Wenlan's *The Concise Edition of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 Ren Hu**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 Bolshevik ) : Short Course*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Fan Wenlan's transition from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hen Fan compiled *The Concise Edition of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 C. P. S. U. ( B. ) : Short Course* was his main theoretical source. Following its structure , *The Concise Edition* established a framework influencing the writing of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in the following decades.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oretical inquiry , Fan Wenlan not only corrected some flaws from the past works in their use and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 but also , to some extent , overcame the dogmatic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process of revising *The Concise Edition of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Max Weber , Genealogy , and the History of the Spirit of Modern Capitalism // Li Fangchun**

Max Weber's cultural-history masterpiece ,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 contain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method , "genealogy" , which he inherited from Nietzsche. He transforms into a method for cultural and social science. The primary task of this method is to identify and determine the cultural "parentage" of an "historical individual". Weber carries out a brilliant "genealogical" analysis of the "birth" of modern Western capitalist "spirit" and henceforth , establishes *The Protestant Ethic* as a classic in the modern social and cultural scienc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ocial History to History of Emotions: French Historian Alain Corbin // Zhou Xiaolan**

Alain Corbin belongs to the generation of historians that grew up under the dominant influenc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Under the guidance of Ernest Labrousse , he examined Limousin's unique economic and societal landscap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his dissertation project. This experience made him realize the limits of Labrousse's research paradigm. After that , he followed the mental history approach first proposed by Lucien Febvre in the 1940s and traced the evolution of olfactory and auditory senses , as well as the social imaginaries that derived from them. In doing so , he constructed a sensory system , and eventually established his history of "sensibilités". After Michel Foucault's publication of *History of Sexuality* and the May 1968 event that shocked the French academia , Corbin shifted his focus to the marginalized groups or individuals in his subsequent research. This approach , is known as "une histoire sans nom" . Thanks to the considerable theoretical progress in the field , Corbin has been attempting to contextualize literary materials so as to develop a unique paradigm for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since the early 2000s. Throughout his life , Corbin has been looking for a historical synthesis outside Braudel's total history paradigm. His career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French historiography since the 1970s.